昆明学院学报　2019，41（2）：32～37　ISSN 1674－5639　CN 53－1211/G4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边疆治理研究】

清代海南海患的防御措施

陈逸飞
（广西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摘要：清政府对海南海患所采取的防御措施是一个不断完善强化的过程。前期主要为对水师结构、装备与巡防体系的初步设置以及填充调整；中期针对跨国跨省的海盗问题，主要为跨国、跨区域的联合缉捕，同时强化乡勇防御的作用，建设起完整的巡防体系；晚期在海盗与西方列强并存的态势下，官方与民间双管齐下，同时加强守备，通过新式兵器以及军队等改革，海南岛此时的防卫已然是达到巅峰，逐步迈向近代化海防的大门。

关键词：清前期；清中期；清后期；海南海患；防御措施
中图分类号：K249；K252；K928.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9）02－0032－06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9.02.006

Defensive Measures of the Marine Catastrophe for Hainan Island in Qing Dynasty

CHEN Yifei
（College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Nanning，Guangxi，China　530006）

Abstract：The defensive measures taken by the Qing government for Hainan marine catastrophe are a process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strength.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they mainly aim at the preliminary setting of the navy's structure，equipment and patrol system adjustment. In the middle of Qing Dynasty，for the transnational cross-provincial piracy problem，they are mainly for transnational and cross-regional joint arrest，and at the same time for strengthening the role of township defens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plete patrol syste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under the situation of the coexistence of pirates and Western powers，the government and citizens are two-pronged to strengthen the guard，and through the weapon and military reform，the local government obtains the strongest defense power and even modernized marine defense.

Key words：the early Qing Dynasty；the middle of Qing Dynasty；the late Qing Dynasty；marine catastrophe of Hainan Island；defensive measures

目前关于清代海南海患防御措施的研究，因海南岛在清代隶属于广东，故不少著作在对广东海防措施的论述中都会提及海南岛的防御措施，如杨金森，范中义所著的《中国海防史》[1]、《广东海防史》编委会编写的《广东海防史》[2]以及穆黛安的著作《华南海盗（1790－1810）》[3]，但因并非论述重点，往往只是一笔带过，并未详细阐述。通史性的著作如林日举的《海南史》简要叙述了海南水师的兵力部署[4]；周伟民、唐玲玲的《海南通史》也囿于篇幅，只是简要分析[5]。目前专题性的研究有何永涛的《试析张之洞与晚清海南海防事业的发展》[6]与董茜茜的硕士论文《晚清时期海南岛海防建设研究》[7]，都主要着眼于张之洞督粤期间对海南岛海防设施的建设。王宏斌的论文《论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海患与水师巡洋制度之恢复》则从全国沿海水师巡洋制度恢复的角度进行研究，[8]对理解海南水师巡洋制度的变化也大有帮助。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清代海南海患的防御措施分阶段再加解析，尝试提出一些新的

收稿日期：2019－03－07
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清代西南边境管理研究”（18XZS039）。
作者简介：陈逸飞（1993—），男，福建福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清代海疆史研究。

看法，不妥缺漏之处，还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清前期的防御措施

清前期①（1644 年—1735 年），海南海患主要为明朝残余势力，他们既抱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以夺取海南进行割据为目的，但又为了生存，往往通过掠夺、绑架等手段获取所需的物资，补充队伍。海南岛因为其本身的地理因素限制，无法像其他沿海区域一样进行居民内迁，但据司徒尚纪的研究，“海南岛沿海各县，虽未令迁界，但岛四周仍立界 2700 余里，禁止居民外出。”[9]除了在沿岸施行海禁政策试图断绝海盗的补给之外，清政府对海南防卫也做了相应的调整，主要为水师结构与船只的调整、本岛连界巡防的初始设置以及巡洋会哨制度三个方面。

（一）水师结构与船只的调整

海南岛上驻军主力为绿营兵，最高指挥机关是镇标，驻所在琼州府府城，最高长官为总兵，受两广总督管辖。海口、儋州、崖州三地皆逐渐设置水师进行防御，并且规定了详细的巡防区域。因各营除地点未有移动，但名称伴随建置调整时有变化，故都概称水师。在清前期，初步设置了一北一南两大水师，即最先设立海口水师与随后在雍正八年（1730 年）设立的崖州水师。

海口水师在顺治年间便已经设立，驻所在海口所城。最初时仅仅有一名琼州镇标右营游击，一员守备和两员千总训练水师。到康熙十七年（1678 年），“改水师副将镇之，更设左右营守备二员”[10]771，清政府合并了原先的左、右营，设立海口营，将海口驻守水师指挥官改为级别从二品的副将。为了更好追捕以及巡查海盗，雍正时期，海口营在船只配给上逐步添设，对海口防卫逐步重视。雍正六年（1728 年），“将河内快哨船六只俱改为外海拖风船”[10]770，七年（1729 年），“添设左右两营快桨船一只，两营配兵巡防”[10]770，十年（1732 年），又给左营配给一只快哨船。

崖州营在设立水师营之前便分防三亚、大疍、望楼三个港口，但职责并不明确，没有专门的水师，但是在雍正六年（1728 年），也与海口营一样，添设了三只外海拖风船。崖州在雍正八年（1730 年）才正式设立水师，指挥官由游击升级成参将，同时在军事编制中增加了一名专门负责水师的千总，把两名陆路把总转换为水师，给崖州营又增加了三只外海哨船。但崖州水师所配船只也只是游巡原先所管辖的三亚港、大疍港、望楼港一带洋面。

（二）本岛连界巡防体系之始

海口水师与崖州水师的设立，是海南岛本岛连界巡防体系极为重要的两大基石，在此后巡防体系的完善过程，基本上是对海口水师与崖州水师巡防范围的扩大或者划分。但在康熙年间（1662 年—1722 年），实际上进行巡防的只有海口水师，管辖范围也十分有限。琼州府知府贾棠就对当时的巡防状况提出忧虑，“但水师所辖汛地，东至会同县之潭门，西至临高县之马袅而止。其余州县亦各有港口通海，系琼镇陆路兵丁防守，从未设有水师兵船”[10]833，并提议在儋州、万州、崖州三地分拨战船。由贾棠的奏议中可以得知，最初，海口水师巡防的范围为会同县潭门港至临高县马袅港一带洋面，主要保障琼州府治所所在地的海上安全，应对来自北部的海上威胁。而其余各地仍以港口防卫为主，其重心更在于防范居民出海。崖州水师的设立后，清政府已有通过两大水师防守全岛的意图，但当时海患渐平，需求推动力不足，且雍正皇帝在位时间较短，便暂时搁置下来。但以实际情况来看，两营水师巡防范围不大，海南岛沿岸海面存在大面积的防卫空档，而崖州水师虽设，但因兵力不足，防卫起来也颇为吃力。

（三）巡洋会哨制度

除了调整水师营之外，清政府也继承了明朝的会哨制度。海口营分为上下两班，各会哨两次，“上班以参将出洋为统巡，每年定期三月初十日，带领舟师，会同龙门协统巡副将、海安营总巡游击，齐集涠洲洋面，会哨一次。五月初十日，与西

①本文所涉及的清代分期，为便于总结各阶段所采取的防御措施，粗略将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归为清前期，即 1644 年至 1735 年；清中期则为乾隆、嘉庆两朝以及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前的道光时期，即 1736 年至 1840 年；清后期为 1840 年至 1911 年。

上路统巡阳江镇总兵齐集硇州洋面，会哨一次。下班以守备出洋为总巡，每年定期八月初十日，随统巡总兵带领兵船，会同海安营分巡守备、龙门协总巡都守，齐集涠洲，会哨一次。十一月初十日，随总兵带兵船，会同西上路统巡阳江镇标中军游击，齐集硇洲，会哨一次。”[10]772 通过上下两班会哨，将两广洋面巡防连成一片，在一定程度上对海盗的活动起到威慑作用。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海南的巡洋会哨只有海口水师在执行，并且主要是为了保证两广洋面的巡洋完整。

二、清中期的防御措施

自杨彦迪海上武装覆灭后，海南海患逐步平息。乾嘉之际（1790 年—1810 年），海患再起，清廷一开始对此并不重视，一来当时时局已稳，二来清廷并不认为这些海盗能够掀起多大波澜。但海盗武装并未如清廷所想只是小打小闹，反而如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势渐燎原，由西南两广洋面蔓延至东南闽浙洋面，在这其中，安南势力的参与是这股燎原火的重要助燃剂。为了解决游弋在中越洋面的海盗，清政府展开了一系列联合缉捕的行动，并且完成了海南岛本岛的连界巡防体系，防守更加缜密。

（一）跨区、跨国联合缉盗

跨区联合缉盗的一个突出案例是发生在乾隆年间“崖州案”。谢贵安、谢盛的《从〈清实录〉看海南的航海和海盗问题》也提到此次事件。[11] 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参将钱邦彦在追击袭击崖州的海盗过程中战死，由此揭开了崖州案的序幕。海盗拒捕并杀害将领，这一事件一经上报就引起了乾隆的极大关注，在《清高宗乾隆实录》中从头到尾十分详细地记录了这一事件的处理过程。在清军官兵最先捕获的海盗关应华供述海盗首领及残余海盗躲到了安南国的短绵农耐处后，乾隆便派福康安多次照会安南国国王阮光平，让阮光平协助缉拿逃犯。同时下旨让沿海各府县官员都仔细缉捕。

这一事件，通过乾隆的命令，发动沿海各府县以及安南国军队共同对海盗进行跨区域甚至是跨国界的严密追捕，最终效果显著，“崖州拒捕戕官首、伙盗犯分别正法，并拿获盗首大辫三、李广才及各船拒捕伙犯二十五名。”[12] 不但将崖州案逃犯抓捕归案，同时在抓捕过程中，对官吏的整治以及来自最高统治者的指令也使得沿海官员对缉捕海盗更加出力，打压了海盗的嚣张气焰。另外一个例子则是追捕越南巨盗陈加海的案例，清军与越南土目联合作战，史载：“越南土目禀报，生擒陈加海即阮保。”[13] 谢贵安、谢盛的《从〈清实录〉看海南的航海和海盗问题》已对其进行了事件过程的陈述，此处便不再进行展开叙述。[11]

（二）招募乡勇，辅助防御

兵科给事中陈昌齐在《洋面缉捕事宜疏》中就指出了广东西路水师兵力较弱，官兵追捕不及的问题：“高、廉、雷、琼等府皆土旷人稀，城市村镇相距辽阔，每遇该匪行动，或离塘汛稍远，在官兵实有鞭长不及之势”[10]838，并且提议招募沿海熟悉水势、身体健壮的乡勇防守村庄，给予重赏。在嘉庆初期（1796 年 – 1810 年），乡勇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已经是地方防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应对突发袭击时因为就在当地，反而比官兵更能发挥作用，成为官兵到来前的第一道防线。如在嘉庆二年（1797 年），张保仔抢劫文昌的铺前、清澜港时，就有“乡勇张锦文率众御之，战于南沙港，杀贼十七人，贼乃遁”[14]288 的记载。嘉庆五年（1800 年），乡勇黄玉纯与林开荣等人击退了侵犯铜鼓的海盗，“杀贼七人，余窜归船”[14]288。嘉庆十五年（1810 年），海寇从东水港上岸，抢掠周围一带的村落，“时澄迈知县盖运长招募乡勇五十人”[14]258，供应口粮，协助陆兵与水师官兵共同对抗侵犯的乌石二、海田久等人。从数次击退海寇的记载上来看，乡勇的存在确实是缓解了来自守军数量不足的压力，对小股海盗来说还是比较有威慑力的，譬如张锦文、黄玉荣等乡勇的存在，就使得铜鼓面对海盗时有一战之力，甚至数次击败来犯海盗，使得“贼不敢复窥铜鼓”[14]288，在数年内，都没有海盗侵扰的记录。

（三）招剿并用政策

嘉庆年间旗帮海盗的平定，离不开清政府所采用的招剿并用政策。在清中期历任两广总督中，最为突出是那彦成和张百龄。这两人都施行了招剿并用的政策，但两者却有所区别。那彦成是在清军难以战胜海盗的情况下以重金招抚，海盗并无畏惧，

也无性命之忧，甚至将受招抚作为谋利的渠道之一，譬如在穆黛安的《华南海盗（1790－1810）》中就提到安置好的海盗逃跑的情况。[3]121 而张百龄招抚张保时，已经在对海盗的作战中取得了较大的优势，在嘉庆十四年（1809 年）二月，“围贼香山属万山，生擒二百余人”[15]401，十月“困张保于新安赤沥角大屿山，毙贼三百余人”[15]401，张保等归降，其本质原因是难以对抗清军，为保存性命而为之。张百龄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招抚，与那彦成以重金、官爵利诱海盗归降的招抚政策，本质上就有所不同，最终也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那彦成以兵不足用，乃招抚盗首黄正嵩、李崇玉，先后降者五千馀人，奖以千总外委衔及银币有差。”[16]11460 那彦成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招抚海盗，海盗归降的数量也不少，但海警频发依旧，海盗劫掠并未有所缓和。而此前那彦成上奏将捐监银两作为军费，解决“粤东缉捕洋盗经费不敷”[17]334 的问题，如今却花重金抚盗，难免招致不满。在孙玉庭的弹劾下，那彦成最终被革职。其后继任的几位总督也并未有所突破，直到嘉庆十四年（1809 年）张百龄到任，清中期的海盗问题才最终得以解决。

兵科给事中陈昌齐曾经提出应断绝海盗物资来源，“于各埠头访拿济匪粮物，于各市镇严缉代匪销赃，以绝水陆勾连之路”[10]838。张百龄对此也十分赞同，“时总督百公龄莅任，始以封港之策断贼粮食。会郭婆带、张保相仇杀，制军剿抚并用。”[15]401 他到任后，首先就封锁港口，坚壁清野，断绝海盗的物资来源，其次抓住了黑旗帮郭婆带与红旗帮张保相互仇杀的机会，派人进行招降。“嘉庆十四年十二月，郭婆带同张日高、冯用发、郭就喜等在归善县平海降，自此黑旗遂靖。”[15]401 嘉庆十五年（1810 年），“总督百龄遣人招抚，许以不死”[15]401，张保仔也随之投诚，张保仔的加入，成为了剿杀蓝旗帮海盗重要的一步棋。张百龄以张保仔为突破点，利用他诱捕了乌石二，史载：“张保仔用计诱乌石二入雷之双溪港。提督、总兵各以大兵扼其后，以乡勇拒于前，生擒乌石二等数千人”[14]289，平定了蓝旗帮海盗。之后逐个击破，“及是海氛遂靖”[15]402，“海南人被贼掳者，俱放回家，兆姓始宁”[18]259，在之后的二十余年，海南地方志书上便几乎没有海寇袭扰的记载。而张保仔改名张保，后来官至福建闽安协副将，为清政府驻守澎湖列岛。

（四）本岛连界巡防体系的构建

继海口水师与崖州水师的相继设立，并确定了比较有限的巡防范围后，乾隆三十三年（1768 年），清政府在此基础上继续构建海南岛本岛的连界巡防体系。首先，崖州水师的巡防范围有所增加，原先属于儋州营以及万州营的一部分洋面也划归到崖州水师的管辖中，“将儋州营自新英港南炮台起，下至昌化县马岭塘交界一带洋面，万州营自东澳港起，下至崖州赤岭港交界一带洋面，均拨归崖州营游巡”[10]772。这样一来，崖州水师在此时基本上负责了海南岛由自儋州新英港南炮台起至万州东澳港，差不多是海南岛南部半个岛屿沿岸的洋面，而海口水师所辖洋面与崖州水师相接，管辖范围为自新英炮台以北至万州东澳港一带的洋面，基本覆盖了海南岛北部半个岛屿沿岸的洋面，此时海南岛本岛连界巡防体系已经基本成型。

其次，在道光十二年（1832 年），海口水师与崖州水师之间有一次对调，起因是总督李鸿宾镇压了儋州与崖州的黎族起义后，认为崖州营所设置的参将级别太低，不足以弹压当地的黎族起义，便上奏请求把从二品的海口协副将与正三品崖州营参将进行对换。因此，海口协水师副将驻扎到崖州，为崖州协水陆副将，管理崖州的水陆两营，崖州营此时改变成为崖州协营。崖州营原先设置的守备职责没有变化，仍然管理水师事务，并且与崖州协水陆副将相互轮替巡洋。但是海口协标水师都司变成崖州协中军都司，负责防御陆路，不再管理水师。此时崖州协营水师有“千总一员，把总二员，外委三员，额外四员，共官十二员；守步兵二百五十八名，大小师船四号”[10]773，实际派出的巡洋兵数目是一百四十六名。

海南岛本岛连界巡防体系的最终完善是在儋州水师建立后。儋州水师直到道光十六年（1836 年）才设立，也因此，儋州水师所管辖的洋面是在海口水师与崖州水师所辖洋面中细化出来，是对两营水师军事部署的衔接者。儋州营原先并没有水师，因此儋州洋面以新英炮台为划分点，以南归崖州水师，以北归海口水师巡查，但这样一来崖州水师所管辖的洋面范围实在是过于广阔，崖州水师巡洋兵数量远远少于海口水师，但巡洋范围却超过了海口

水师，巡洋力度与效果实在难以令人满意。护道张堉春与总兵陈步云、谢德彰等人在道光十四年巡海经过儋州时，就对儋州防务提出了担忧：“崖州舟师单弱，且隔四更沙，险阻难越，不能兼顾。海口营相距亦远。又昌化县属有海头港，地方帆樯辐辏，奸宄易藏，最关扼要，向无汛守。”[10]773因此，张堉春奏请添设儋州水师营，专门负责海南岛西面防御。道光十六年（1836 年），儋州水师营就以新英港南北二炮台以及博顿汛、英潮二汛原有的陆路守军为基础，改组水师营，指挥官为儋州营游击守备。同时“于通省各水师营内抽出守步兵一百二十名，海安、海口、龙门左右四营各抽出捞缯船一只”[10]772，补充儋州营缺少的人员与船只，并且调来阳江镇标一员千总专门管理儋州水师事务，把博顿汛守军移驻到形势复杂的海头港。至此，儋州营所负责昌化县四更沙到临高迸马角止五百余里的洋面，海口、崖州、儋州三地水师所负责洋面划分完全，临高迸马角止为海口水师与儋州水师分界，昌化县四更沙为儋州水师与崖州水师分界，万州东澳港为海口水师与崖州水师分界，三营所属洋面区域连成围绕海南全岛沿岸的洋面，构筑成海南岛“三点成面”的海防格局，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海防分管体系，此时本岛连界巡防体系完全形成。

三、清后期的防御措施

清后期（1840 年—1911 年），海盗的威胁依旧存在，尤其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军的内外巡洋基本陷入了停滞，海盗行动无所顾忌，来去无忧，掀起了又一轮高潮，而驻守官兵实力远逊海盗，常出现避而不战的举动，譬如在道光三十年三月，“贼劫海口钱铺数处，官兵知之不追”[19]，以至于“海盗玩视水师，常有劫掠”[19]。

（一）地方武装的加强

为了弥补海南岛上官军不足，对于海盗侵扰鞭长莫及以及难以对抗的问题，不少村县都加大了雇佣乡勇的力度，以求安全。尤其是在遭受劫掠频率极高的文昌，在“邑令袁名洋置若罔闻”的情况下，当地绅耆自发组建安全社，“募集乡勇，备器械，筑土坡，日夜巡哨”[14]290，这些防御举措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在侦查到乡民的行动后，“贼始遁”[14]290。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乡民数十人邀击之，毙贼一名，生擒贼四名解郡”[14]290，使得海盗一段时间内“不敢深入”[14]290，只敢在近海一带活动。

不但民间加强了防备，一些官员也从官方的角度加强整顿各自所辖州县的防卫力度。如临高县令聂缉庆，他于光绪十三年（1887 年）上任后，增加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雇勇备船沿海堵缉，禀请督、抚、宪派拨镇涛轮船协同巡缉，广购眼线，不吝重赏”[15]403，在高强度的巡缉之下，付出的努力很快取得了成效，“光绪十四年（1888 年）八月十七日掳获陈五卿于伙犯人谢得六、周二当、符四文等多名，斩枭示众”[15]403，除掉了为害临高已久的海盗陈五卿一伙。崖州知州钟元棣也在到任后就与崖州守备黎献廷开始加强巡查力度，“督水军封港登岸，合驻扎琼军搜索”[20]316，将上岸的海盗陈仁等三名首领就地正法。

（二）张之洞强化海防

在海盗的威胁之外，晚清时期海南岛还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垂涎窥伺。鸦片战争（1840 年）之后，西方列强逐渐注意到海南岛这一南洋贸易的中心。琼州和崖州一北一南，与东南亚贸易频繁，不仅仅在物资层面，还在劳动力层面。当时英、法等国在东南亚大肆开发殖民地，南洋劳动力紧缺，英、法等殖民国通过种种手段，或招募、或诱骗、或拐卖，通过海口口岸获得大量开发所需的劳动力。尝到甜头的西方列强闻风而至，无一不想伸手分一杯羹，都要求在琼州开放通商口岸，企图将势力伸进海南岛。同治十年（1871 年），英国“请开琼州商埠”[16]4528，十二月，“俄人请援各国例通商琼州”[16]4493；“法、俄、美、布各国咸以为请，允仍开琼州。”[16]4528尤其是占领越南之后蠢蠢欲动的法国，在距离上咫尺可至，更是毫无掩饰这一意图。兵部侍郎曾纪泽明确点明：“近日琼州情形较之台湾尤为吃重，法人既据全越，即不能忘情于琼州，在我宜增琼州之守备，以杜法人之觊觎”[21]17。在光绪十五年（1889 年），法国兵船肆无忌惮“驶进琼州所属崖州东百里之榆林港测探水道，上岸钉桩插标”[16]4570，其觊觎之心昭然若揭。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法国甚至明确提出：“要求琼州不割让租借于他国”[16]4572，生怕自己在海南的利益有所亏损。

张之洞督粤期伊始，就对海南岛的军事地位有着极其明确的认识："窃照琼州一岛，为海疆第一要冲，孤峙大洋，逼近越境"[21]36，同时指出西方列强都十分羡慕英国在得到香港之后商贸与停舶修造兵轮的便利，"于中华洋面诸岛莫不欲探得善地"[21]45，而海南岛条件优良，"非惟一国之觊觎，实为列邦所属目"[21]45，正是在这样的忧惕下，张之洞对海南岛的防卫建设极为上心，"就琼州原有制兵，酌设练军，并加练饷，一洗绿营积弊，旧额4900 余人，按七底营抽练，共编练 1750 人。崖州等处水师，加以整顿，原有拖船，亦配拨练军，以二艘驻崖州，二艘驻儋州，二艘驻海口，二艘驻海安。其守兵 2000 人，匀拨紧要塘汛。"[16]4117－4118董茜茜在其论文《晚清时期海南岛海防建设研究》对张之洞的一系列举措做了详细的论述，[7]49－57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训练新军，二是铺设电线电报，三是配给西方新式武器，四是修建新型炮台，五是测绘琼防图，六是修建榆林港。

其中，修筑榆林港自法船测水事件后，张之洞就上书陈言榆林港"水深能泊铁舰，并可取水避风"[21]50，是"海军必争之地"[21]49，并根据榆林港两山环抱的葫芦型地势，在东面乐道岭和西面的独田岭设置三座炮台，以六尊新式大炮武装。不独榆林港新修炮台，在海南各处，张之洞仔细勘察后也设置了多个新式炮台，并订购多尊长炮进行配备，如海口四路东西炮台十八座，同时提出了修建跑路通行炮车等一系列举措，推进海南岛当时海防体系的近代化改造。

结语

海南对于海患的措施始终在不断强化，清前期，清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对海南水师建置的逐步修补填充，对巡防体系初步设点，整体的防卫都较为粗糙，重心也主要置于防黎之上，仅有海口、崖州水师，一北一南，兵力缺乏，船只也少，难以承担起防卫任务。至清中期，海南岛的巡防体系才真正完成，兵力上虽有欠缺，但通过乡勇等补充手段，已经能够有所反击。清后期，民间防卫与官方防卫都进一步加强，官员们对海南岛的地位也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通过新式兵器以及军队等改革，海南岛此时的防卫已然是达到巅峰，逐步迈向近代化海防的大门。

［参考文献］

［1］杨金森，范中义．中国海防史［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2］广东海防史编委会．广东海防史［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

［3］穆黛安．华南海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林日举．海南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268－271．

［5］周伟民，唐玲玲．海南通史：清代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6］何永涛．试析张之洞与晚清海南海防事业的发展［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76－79．

［7］董茜茜．晚清时期海南岛海防建设研究［D］．海口：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院，2018．

［8］王宏斌．论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海患与水师巡洋制度之恢复［J］．近代史研究，2018（2）：82－99．

［9］司徒尚纪．中国南海海洋文化史［M］．广州：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经济出版社，2013：225．

［10］明谊，张岳崧．道光琼州府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11］谢贵安，谢盛．从《清实录》看海南的航海和海盗问题［J］．新东方，2011（3）：15－16．

［12］佚名．清高宗乾隆实录［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517．

［13］佚名．清宣宗道光实录［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505．

［14］张霈，林燕典．咸丰文昌县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

［15］聂缉庆，张延，桂文炽，汪瑔，等．光绪临高县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

［16］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7］卢坤，邓廷桢．广东海防汇览［G］．王宏斌，点校．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

［18］龙朝诩．光绪澄迈县志［M］．陈所能，纂修．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

［19］朱为潮，徐淦．民国琼山县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525．

［20］钟元棣，张嵩．光绪崖州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21］周伟民，唐玲玲．张之洞经略琼崖史料汇编［G］．海口：海南出版社，2015．